

# 朱丹溪甘温助脾学术经验及其后续影响

茅 晓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0032)

医案是医家诊治疾病的记录, 最直接、真实、客观地反映医家治病经验和特色。本研究从录载于《名医类案》的丹溪医案入手, 经归类整理统计分析, 凸显其甘温助脾的学术特质。不仅展现于朱氏临床的各个层面, 而且通过这些医案对后世数百年间诸多医家在温补领域的理论和临床产生了不容低估的重要影响。

## 资料依据

朱丹溪无医案专著存世, 所见医案散落于朱氏自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及门人编辑的《金匱钩玄》、《丹溪心法》等书。《名医类案》首次汇总丹溪医案 339 则 (除去重复), 其病证范围涉及内、外、妇、儿、伤、喉、眼等临床各科, 共 66 种。医案相对集中的病种 (从多到少) 依次为伤寒、中风、痈疽疮疡、遗精、积块、痘疮、火热、疟、经带、血证、痢、噎膈、痛风、喘、恶寒、产后、心脾痛、湿、胎毒等 40 余种, 相对分散的病种如痉、呕吐、劳瘵、吞酸吐酸、腰痛、胁痛、前阴病、疔风、癰疹等 10 余种。所有病案中, 有 303 则病案以内服药治疗为主, 占总案量的 89.38%, 其余病案或用心理疗法, 或调整饮食起居, 或以外治手法, 或无须治疗的共占 11.62%。通过对每一则以内服药治疗的病案选用中药频次的列表统计, 发现其选用频次由多到少呈如下排列: 人参 (152)、白术 (150)、甘草 (145)、当归 (117)、陈皮 (115)、白芍 (91)、川芎 (87)、生姜 (79)、茯苓 (75)、黄芩 (75)、半夏 (73)、黄芪 (66)、地黄 (49)、黄连 (44)、苍术 (42)、黄柏 (41)、木通 (31)、升麻 (27)、桃仁 (27)、羌活 (25)、大枣 (24)、枳壳 (20)、竹沥 (20)、牛膝 (19)、红花 (17)、南星 (17)、防风 (16)、五味子 (16)、滑石 (15)、知母 (15)、葛根、大黄、附子、荆芥 (14)、山梔、香附、麻黄 (12)、瓜蒌 (11)、砂仁 (10)。也即有 50.16% 的病案用人参、49.50% 的病案用白术、47.85% 的病案用甘草, 而用当归、白芍、川芎的病案分别为 38.61%、

30.03%、28.71%, 有 37.95% 的病案用陈皮、26.07% 的病案用生姜、24.75% 的病案用茯苓、24.09% 的病案用半夏, 而用黄芩、黄连、黄柏、知母的病案分别为 24.47%、14.52%、13.53% 和 4.95%。在所有病案治方中, 应用人参、白术、黄芪的案有 203 则, 占 70%。

统计资料表明丹溪医案并非以知母、黄柏泻火滋阴见长, 相反更注重甘温补益脾胃法的临症应用。善用参芪术草归芍芍地等, 在四君、四物、二陈、小柴胡、补中益气等常用方中则更推崇四君子汤的应用。这一结论似可纠正长期以来医界对丹溪学说的曲解。

## 论治特点

1. 甘温助脾, 扶正达表 主用于伤寒热证、伤风、恶寒、暑、湿等外感病证。以集案最众的《伤寒门》为例, 34 案中用人参达 31 案, 用甘草 29 案, 用柴胡 22 案, 用白术 20 案, 用黄芪 12 案, 选方以补中益气汤、人参养胃汤的组合最多, 此外有小柴胡、四物、参苏饮、正气散等。参芪术草, 甘温扶正、益气助脾合柴胡疏散表邪为其特色。如治罗光远伤寒发热四肢不遂, 用补中益气汤而愈; 治朱宽年伤寒肚腹疼痛发热如火, 用人参养胃汤加柴胡、煨姜“服之愈”; 治项太一伤寒头痛发热, 胁痛四肢痛胸痛不止, 投小柴胡加羌活、桔梗、香附、枳壳而愈。后世张介宾倡用扶正发汗治虚人外感, 朱氏乃发其先声者也。

2. 益气温通, 治疗中风 《中风门》集案仅次于《伤寒门》, 达 27 案之多。虽然朱氏以“湿生痰, 痰生热, 热生风”赅中风病机, 案中多有二陈汤之加味应用 (含 10 案), 但参、术、芪、草的选用频次分别为 12、11、6、16, 归、芍、芍、地的选用频次为 11、8、4、6。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加味应用尤其抢眼。如治时付三患中风“双眼合闭, 晕倒不知人, 子也不识。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二合愈”; 治王从一中风“十指尽麻木并面麻, 乃气虚症, 补中益气汤加木香附子各五分愈”; 徐

浦三患中风四肢麻木无力半身不遂，乃色欲伤，以四物汤加参芪术僵蚕地龙全蝎等而愈。此外，小续命汤、乌药顺气散等方之用也常佐以人参、白术等。

3. 温补培元，挽治疟痢 《疟》、《痢》二门共载案 21，人参、白术的应用频次分别为 11 和 16。辨证重虚，善用温补脾胃元气是其特点。一人久疟虚甚，盗汗得嗽，嗽来便热，夜甚，朱即以“甘草些少、白术二钱、防风一钱、人参黄芪黄连各五分、干姜二分，数服而愈。”又治一富家子年壮病症，入房太甚，寒邪入舍于阳明，阳气益损，乃遣以“参术大补，附子行经，加散寒以取汗”，再以苍术、川芎、桃枝煎汤浸足，“汗出通身而愈”。一老人因饮白酒作痢，下淡水脓血，腹痛，小便不利，里急后重，朱以参术为君，甘草滑石槟榔木香苍术为佐使，下保和丸三十粒，次日“前症俱减，独小便不利，以益元散服之而愈。”又一五旬之人，夏间患痢，腹微痛所下褐色，后重频并，食减或微热，脉弦而涩，朱曰：“此忧虑所致，心血亏，脾气弱耳。”遂以参术为君，加当归陈皮川芎芍药茯苓黄连，“二日而安”。

4. 温养气血，除块排痈 《积块》门载案 14，《痈疽》、《疮疡》门载 13（另有 6 案未出方药）。总共 27 案中，14 案用人参，12 案用白术、当归，8 案用川芎。丹溪经验表明，痈疽、肿块等外症常因体虚不足而难愈，故温养气血尤显重要。如其治疮疡、背痈疽疮 10 案，几乎每案皆用参芪术归芎之类，温养气血、托毒排脓、消积除块。如治一五旬患者，右膊外侧生核红肿如栗，辨属气虚“忧患伤血”，以人参膏下竹沥，继以“参膏入芎术汤姜汁饮之，尽参三斤，疮溃”，再以四物加参术芎归陈皮甘草半夏生姜，服之而愈；一老人背发痈疽径尺，他医与五香十宣散无效，患者素有淋病，“急以参芪归术膏，以牛膝汤入竹沥饮之，淋止思食。尽药四斤，脓自涌出而愈”；一人形实色黑，背生红肿痛甚，脉浮数洪紧，时值冬月，与麻黄桂枝汤合人参生附子黄芪酒柏等“六贴而消”。在“积块”14 案中亦颇注重温养气血的应用。如一妇胸痞有块，脉弦细虚涩，以补中益气汤合痞气丸相间与之取效；一妇因忤意而乳下贴肋间结一块，微痛膈闷食减，脉微短涩，外贴琥珀膏，内服参术芎归佐理气药治之而愈。

此外，在经水、崩漏、带下、转胞、交肠、恶阻、堕胎、难产、产后及胎毒、痘疮等 50 余则妇儿科病案中，其治皆广用甘温助脾、益气养血之

辈，与内外科病症之治用甘温形成了统一格局。

### 后续影响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医学术发展历程中，未曾见到朱氏温阳助脾学验的应有位置。然而他的实际治病经验（339 则医案）却明白无误的展示给医界一个本真的面目。凭借朱氏强大的学派体系和大量存世医案，使其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明代的温补学术潮的形成、发展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成为可能。初陈其三条学术传承路线：

#### 1. 汪机——黄古潭——孙一奎

祁门汪机（1463~1540）学宗丹溪之学实已是丹溪去世百年之后。《明史》称汪氏“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医名之重，可见一斑。作为私淑弟子，汪机以善用参芪著称。其“营卫”论<sup>[3]</sup>认为营卫之气皆赖脾胃水谷以生，参芪味甘性温，为补脾胃圣药，脾胃无伤营卫便有所资，元气即有所助，邪就不治自除。《名医类案》录汪氏医案 157 则，从所治 51 种病症言，他不仅主用参芪“甘温助脾”、固本培元治疗内伤虚损、消渴、热症、心脾痛、呕吐、麻木、痿、痢、癫狂心疾、疮疡痈肿、妇人痛经崩漏产后病，以人参浓汤治婴儿泄泻，以附子理中汤治肾虚火热，还用参芪配伍气药“补脾散郁”调治诸气，以“升补阳气”法治癰疽等等，以致有人发“震亨之学至汪机实大有变异，与震亨泻火养阴之旨已面目全非”<sup>[1]</sup>之叹。其实汪氏步丹溪后尘，力主参芪甘温补益较之其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一种学术上的继承出新。如果把汪机定位为“江南地区培元温补派形成的先驱者”<sup>[2]</sup>，丹溪的学术影响亦不言自明。

黄古潭“徽黟人也，汪石山翁弟子，少业儒，通五经。以疾就医，治病每有超见”<sup>[3]</sup>。休宁人孙一奎学承黄氏，经传接中介得以沿袭汪机之学。将汪氏参芪之用与薛己温补下元之法有机融合，即以附子、肉桂与人参、黄芪合方，创用集诸多温阳药与甘温补气药相伍为用的壮元散、壮元汤等方，温阳在肾，益气在脾。诚然，孙氏也领略过丹溪治病风范，《医旨绪余》有所谓丹溪“认病最真，而投剂最确，观其治许文懿之病及痛风十三症，可概见矣”<sup>[3]</sup>之说为证。在温补理论上，孙氏“命门动气”说和“三焦为相火，乃原气之别使”论，与丹溪“相火”论，在深探人体生命机制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

#### 2. 江瓘（1503~1535）——江应宿

徽州歙人篁南江氏及其子江应宿，先后历时数十年集辑整理《名医类案》，日夜寝馈于古医案中，

耳濡目染,感同身受。或因资料充裕,或出于学术上的认同,分别将丹溪、汪机、薛己的临证验案高频次地选录书中。三家医案分别为339、157、449则,总计945则,几近全书总案40%(2405则的39.29%)。如果除去一般医事、医话杂项,其案可占五成左右。在141位医家中,唯独朱、汪、薛三家医案独占半壁江山,而三家医案又清一色的独重温补,其对江氏父子的学术影响之深刻不言而喻。江氏二世边学案编书,边临证处方,其学术倾向在潜移默化中日渐形成。从录载于《名医类案》的130余则江氏父子医案言<sup>[4]</sup>,其辨证首重虚损,治外感力倡“补养兼发散”,愈内伤尤善温补收功,凡内外妇儿诸症之治,多善遣用参芪归术、补中益气、四君等方药取效,与三家医案之用温补,颇有一脉相承之感。尽管长期以来江氏二世学验未被学界足够关注,江氏确无特别闪光的学术论点或论著,但是医案俱在,即使没有理论,其鲜明的治从温补的学术精华依然有她的历史地位。其编撰《名医类案》承传温补学说的历史功绩更是无法否认。

### 3. 王纶——薛己——张介宾、赵养葵、李中梓

慈溪人王纶(1453~1510)乃“士大夫以医名者”(《明史》),高官而兼名医。作为私淑弟子,传丹溪之学,尤精杂症证治心法,精娴于甘温除热,不仅善用“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治阳气下陷之内生虚热,且治劳力辛苦发热有“甚者加熟附子”之法(《明医杂著·医论》),其自制补阴丸方,即在丹溪大补阴丸基础上加多味柔润滋阴药,使滋阴学说的理法方药基本完备。

作为稍后于王纶的明代医家薛己(1486~1558)虽幼承家学,得其父薛铠之传。但从其注释整理王纶代表作《明医杂著》而言,授受王氏医学思想之深重不容低估。薛氏身为太医院判,又著作等身,使其“治病求本,务滋化源”论、“真阴真阳”论和善用六味、八味的脾肾温补学验在明代温补学术潮中领风气之先。得天时地利之便,同时代人江瓘竟在《名医类案》书中收罗薛氏医案449则。所涉病症83种,其自出机枢的朝夕补法、急症急补、偏虚纯补等法在案中多有应用。临症善察虚损,脾肾并重、“益火生土”的温补观对后续者张介宾、赵养葵、李中梓等人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强势影响。

张介宾(1563~1640)面对医界寒凉时弊,将其责归于丹溪学说,故撰《辨丹溪》等文商榷朱氏

“阳有余阴不足”论,其阴阳命门理论对生命之阳、命门之火的认识,盖亦与丹溪论人体生理相火一说之本意如出一辙。而在温补法的临床应用层面,对大量虚寒病症广泛采用扶阳兼以益阴之法<sup>[5]</sup>,如左、右归丸、六味回阳饮等方剂的创设使温补治法从整体上获得创新。温补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开拓。鄞县人赵养葵(1573~1644)承薛己之旨,立意于命门水火而尤重命门之火,以“走马灯”为喻形象地描述脏腑功能必须以命门之火为原动力。临症广泛地运用六味壮水、八味益火,突出护养命火为其宗旨。华亭李中梓(1588~1644)有“乙癸同源,肝肾同治”之名论,是对丹溪《相火论》“肝肾之阴,悉具相火”说的进一步阐发。同时强调脾肾先后天为人身之根本,“善为医者,必责于本”,因所治多系文官学士、商业主及中小官僚,体质多虚少实,故“多事温补,痛戒寒凉”,后世言其用补“大法,平正不颇者”,亦属确评之言<sup>[6]</sup>。

### 小结

本研究缘起于《名医类案》中的丹溪医案,丹溪素以“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称誉医林,以致后人多以擅长养阴概其学术。然而最能反映其临证实际的大量医案却显露其甘温助脾的学术经验。肇始于《内经》时代的温补扶阳法历经两汉晋唐宋元明清的嬗递沿革<sup>[7]</sup>,学术的承传出新自不待言。元末明初以降,金元四大家中丹溪医案存世最丰,对后世影响最大。如果把丹溪医案放在温补学术沿革发展这个大背景上予以考察,或许不难发现朱氏这些医案对有明一代温补治法的深重影响。窃以为从古到今,历代名医如此崇尚温补,正说明温补大法的重要和适用面之宽泛,值得医界从理论和临床层面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实践。

### 参考文献

- 1 任应秋. 中医各家学说.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0: 56
- 2 孙一奎. 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844
- 3 孙一奎. 医旨绪余. 南京: 江苏科技出版社, 1983; 1: 98
- 4 茅晓. 江瓘父子医案特色. 浙江中医杂志 2001; (3): 36: 103
- 5 茅晓. 扶阳不忘补阴——张景岳扶阳特点探析.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4; (4): 37
- 6 李中梓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795
- 7 茅晓. 奠基、嬗变、创新、承继——扶阳法历代沿革剖析.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0; (2): 6

(收稿日期 2002年3月4日)